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6冊

高亨《詩經今注》研究

蔡敏琳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高亨《詩經今注》研究／蔡敏琳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2+17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編；第 6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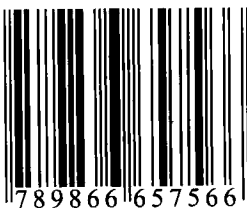
ISBN：978-986-6657-56-6 (精裝)

1. 詩經 2. 注釋 3. 研究考訂

831.12

97012643

ISBN - 978-986-6657-56-6



9 789866 657566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六 冊

ISBN：978-986-6657-56-6

高亨《詩經今注》研究

作 者 蔡敏琳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七編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高亨《詩經今注》研究

蔡敏琳 著

作者簡介

蔡敏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現職為高中教師

提 要

本論文共分為七章，旨在研究高亨《詩經今注》的內容，及其詮釋觀點、方法、價值等。茲依其章節次序分述如下：

第一章是緒論。其內容主要說明筆者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範圍以及近人研究成果的評述。

第二章是高亨的生平傳略與《詩經今注》的成書與體例。所謂「知人論世」，故研究高亨的書，必先了解他的生平事蹟。其次敘述高亨撰著動機、成書時間，說明其成書的經過；最後則分析全書體例，彰明其撰述的方式。

第三章是論述高亨論《詩》的觀點。此章先探討高亨對《詩經》的採集與刪定所抱持的態度；再者考察高亨對於風、雅、頌的解釋；末述高亨對《詩經》的產生地域與寫作時代的看法。

第四章是《詩經今注》的訓釋方法。本章全面論述高亨詮釋《詩經》的方法，共分為三節。首節考察《詩經今注》對於詩旨的探討；次節探究《詩經今注》對《詩經》字詞的訓釋；三節則是針對詩句的部分加以歸納說明。

第五章《詩經今注》對《詩序》、《朱傳》的態度。高亨並非一味駁斥舊說，此章將分別統計比較《詩經今注》與《詩序》、《朱傳》的異同，並舉出實例加以分析，以便進一步了解《詩序》、《朱傳》在其詮釋系統中的地位。

第六章《詩經今注》的得失探討。本章全面檢視高亨對《詩經》所作的分析，歸納說明當中的精采與不足處，並論述高亨《詩經》學術研究方向與態度具有何種發展與前瞻的成就。

第七章結論。本章總結全文，並評覽高亨《詩經今注》一書的成就與貢獻。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介紹	3
第二章 高亨的生平傳略及《詩經今注》之成書與體例	7
第一節 高亨的生平傳略	7
第二節 《詩經今注》之成書與體例	10
一、成書時間與寫作宗旨	10
二、體例	12
第三章 《詩經今注》論《詩》之觀點	15
第一節 論《詩經》的採集與刪定	15
一、論《詩經》的採集	15
二、論《詩經》的刪定	21
第二節 論《詩經》的分類	24
第三節 論《詩經》的產生地域與時代	34
第四章 《詩經今注》的訓釋方法	49
第一節 釋詩旨	49
一、引經傳史事探求詩旨	49
二、結合古代習俗、禮制探求詩旨	53
三、藉判斷《詩序》說法詮釋詩旨	57
四、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探求詩旨	60
第二節 釋字詞	65
一、通過字音求字義	65
二、歸納本經字詞以說明其義	67
三、藉比對上下文意解釋字詞	70
四、引前人之說訓釋字詞意義	72
(一) 引用或修正他人說法解釋字詞	72
(二) 援引群經以佐釋字詞	75
五、並列諸說，不作判斷	77
六、結合古代習俗、制度解釋字詞	78
七、校勘《毛詩》中的訛文誤字	80
八、以闕疑代替訓釋	82
第三節 釋詩句	84
一、先解釋字義或詞義，再串解句義	84
二、先解釋句法，再解釋句義	86
三、藉歸納詩句以說明其義	88

第五章 論高亨對《詩序》、《朱傳》的態度	91
第一節 對《詩序》的態度	91
一、關於《詩序》的區分大小及其作者問題	91
二、《詩經今注》與《詩序》所定篇旨異同的比率分析	96
三、《詩經今注》與《詩序》所定篇旨異同的實例分析	98
(一) 兩者說法相同	98
(二) 說法大同小異	103
(三) 說法相異	105
(四) 說法異同各半	109
(五) 兩者說法未知異同	110
第二節 對《朱傳》的態度	111
一、《詩經今注》與《詩集傳》所定篇旨異同的比率分析	112
二、《詩經今注》與《詩集傳》所定篇旨異同的實例分析	113
(一) 兩者說法相同	113
(二) 說法大同小異	117
(三) 說法相異	120
(四) 說法異同各半	124
(五) 兩者說法未知異同	125
第六章 《詩經今注》得失探討	127
第一節 《詩經今注》說《詩》的優點	127
一、詩旨新詮，常有獨到見解	127
二、訓釋字句，頗為準確簡明	131
三、言出有據，並非鑿空立說	134
第二節 《詩經今注》說《詩》的缺點	137
一、詩旨解說上，時憑臆斷，刻意求新	137
二、文字訓詁上，濫言通假、證據不足	140
三、研究方法上，濫用階級分析，附會政治內容	142
第七章 結 論	151
附 錄	155
附錄一 高亨先生主要著作目錄	155
附錄二 《詩序》和《詩經今注》異同統計表	158
附錄三 《朱傳》和《詩經今注》異同統計表	164
參考書目	17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高亨先生（1900～1986）治學遍及經、史、子、集，著有《老子正詁》、《周易古經通說》、《周易古經今注》、《諸子新箋》、《文字形義學概論》、《周易雜論》、《詩經今注》、《文史述林》等多種學術著作。（註1）這些著作，就學術史的角度作客觀的考察，應該說都具有學術里程碑的意義（註2），高亨可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究史上的一位大家。

然而，後世學者們在以主觀意識研究高亨的子學、文字學，以及《易經》的著述時，因其著眼點的不同，每每產生仁智互見的評論，但是都沒有像對《詩經》的研究一般，有的研究者將之捧上了天，有的研究者卻將之踐踏在地，甚至涉及到對高亨治學品格的懷疑。由於高亨在《詩經》研究上的成就，主要集中表現於他所撰著的《詩經今注》一書，因此評論者多半是針對《詩經今注》而發，例如李泉在〈力創新義求真諦——評高亨的《詩經今注》〉一文中指出：

高亨先生的《詩經今注》，以其全而勝於以往的各種注本，以其對三百篇中很大一部份詩旨的獨特評價，開啓解詩新路，引發學術爭鳴，而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和作用。（註3）

〔註1〕關於高亨的著作，可參考本論文末附錄一。

〔註2〕王洲明：〈從學術史角度評論高亨的《詩經》研究〉，《山東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頁51。

〔註3〕李泉：〈力創新義求真諦——評高亨的《詩經今注》〉，《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1982年2月），頁45。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對於此書尤為推崇：

五四以後，出現過幾個《詩經》全本注釋，但多舊說翻版，冬烘氣重；建國後雖有精心之作，但多選本、譯本，對《詩經》全本以一家之言進行全面系統注釋的則寥寥無幾，而高氏此書則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註4〕

不過，劉精盛卻對於學者們的讚譽不以為然，他說：

《詩經今注》在指導思想上，濫用階級分析的分法；在治學態度上，則是不重證據，主觀臆斷。對於《詩經》的研究，如果我們缺乏「知人論世」的觀念，不是把《詩經》放到《詩經》時代去考察，而是強古人以就我，置語言的社會性、詞義的系統性於不顧，置古人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於不顧，勢必解得似是而非，甚至荒謬已極。〔註5〕

王長華在〈論余冠英的《詩經》研究〉一文中，雖然沒有點名所批評的對象，但是根據上下文的推斷，所指的應該是高亨的《詩經今注》，他提到：

時間已經過去四十年，我們很難忘記某位原本與政治十分疏遠的著名學人在《詩經》研究上為配合政治需要而出現極為幼稚的失誤。〔註6〕

高亨《詩經今注》所獲致正反兩極的評價令筆者頗為存疑，究竟《詩經今注》是大陸近幾十年研究《詩經》最為突出的注本？或者只是為了配合政治需要而出現的幼稚失誤？這些疑問引發筆者對《詩經今注》產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

不過，筆者在細究相關的研究論文後發現，前輩學者在《詩經今注》的研究方面做了披荊斬棘的工作，功不可沒，但是或限於主題，或囿於篇幅，大抵只是浮光掠影式的掃描，所討論的範疇與深度相當有限，所舉的例子更是大同小異，僅憑藉寥寥可數的數例，就對高亨《詩經今注》的治學成績作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對高亨而言，這是相當不公平的。

除此之外，大陸學者對《詩經今注》的研究已經略嫌不足，臺灣學者也許是因為政治氛圍的影響，學術界對《詩經今注》一直是乏人問津的，因此筆者不揣淺陋，選擇以「高亨《詩經今注》研究」作為的主題，務求以較為客觀的立場分析《詩經今注》的成就和特點，評價《詩經今注》在方法和結論上的某些偏頗，希望對《詩經今注》研究不足的情況，略有些微的補足作用，並冀望藉此論文為根基，為日

〔註4〕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396。

〔註5〕 劉精盛：〈評高亨先生《詩經今注》解題之誤〉，《長沙電力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頁5。

〔註6〕 王長華：〈論余冠英的《詩經研究》〉，《第三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頁346。

後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本論文著重高亨《詩經》學著述——《詩經今注》的研究，在研究範圍方面，筆者是以《詩經今注》為主要依據，並以高亨的其他相關著作、書信為輔，適時予以補充。《詩經今注》一書的版本共有三種：最早是 1980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其後臺灣的里仁書局看中它的學術價值，於 1981 年重印《詩經今注》；1984 年又有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版本。本文所使用的是 1980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版本，因為在編排上，上海古籍出版社與臺灣里仁書局兩種版本的編校較為嚴謹（註 7）；而在內容上，兩者除了在〈前言〉的部分有所不同（註 8），在解題方面，里仁書局的版本會略微修改一些涉及階級意識的詞彙，為求能正確解讀作者的原意，筆者選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作為引用的依據。

至於本論文的研究方法，筆者原則上先通讀原典，客觀理解原典，再針對原典內容的重點作歸納分析，使整篇論文有一完整的體系，而不至於駁雜零亂，毫無頭緒可言。此外，筆者以為，無論是研究任何一家的《詩經》著述，都必須瞭解漢代以來，也就是這兩、三千年來學者們的見解，如此才能知其承先啓後的關係，而不只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孤立式研究，因此在撰文之時，筆者會參酌歷代《詩經》學重要著述。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介紹

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而言，專以《詩經今注》為研究對象，對他作深入而全面討論的文章，數量極為有限。在這些為數不多的前人文獻中，最早針對此書作探討的是李泉〈力創新義求真諦——評高亨的《詩經今注》〉（註 9），文章就《詩經今注》的成書經過、特點作了一番說明，並對《詩經今注》的優劣得失加以評價，這篇文章極具參考價值，但是礙於篇幅，在舉證方面往往不夠充分，這是此文的缺憾。

（註 7）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版本，目錄上列有〈前言〉，實則卻沒有，因此筆者以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臺灣里仁書局的版本較為嚴謹。

（註 8）相較於臺灣里仁書局的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詩經今注》在〈前言〉的部分，多出了「我們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勤勞勇敢的人民，在黨的英明領導下，正在進行新的長征。際此人人揚鞭躍馬，爭攀高峰，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時刻，我們怎能不加倍努力呢？！我是一個書生，幾十年來，尤其解放以後，總是爭取多作一些研究工作，多貢獻一點極為微小的力量，已經著有專書十幾種刊行問世，最近所作《詩經今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又使我得到鼓勵，為之欣舞」這樣的一段話。見《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 1。

（註 9）李泉：〈力創新義求真諦——評高亨的《詩經今注》〉，頁 44~47，下轉頁 60。

趙沛霖在《詩經研究反思》一書中也注意到高亨的《詩經今注》（註10），他承繼著李泉文章的觀點，在他的基礎上加以擴充，有系統地論述《詩經今注》的成就、特色與疏失，其內容較前文充實，架構嚴謹，引證精確，可說是《詩經今注》研究中的一篇佳作。

比較後期的作品如盧甲文先後於《湖北大學學報》及《中州學刊》發表的兩篇文章——〈高亨《詩經今注》訂誤〉、〈高亨詩經詞語新探〉（註11），兩篇文章的寫作方式大致雷同，大抵都是針對《詩經今注》中的幾個詞語注釋提出異議，予以訂誤，並對高注某些不當的原因作了分析，它歸納《詩經今注》釋義不當的原因有五：（一）釋義太抽象，用大類名代替具體的說明；（二）釋義錯了，把甲誤解為乙誤；（三）把專有名詞誤釋為一般詞組；（四）把今名搞錯了；（五）濫用假借。從以上五點可以約略知道高亨訓釋字詞的缺失，不過，盧氏的這兩篇文章所取樣的詞語，不是專有名詞，就是一些冷僻的字彙；另外，他在說解時所引用的資料，都是《國語辭典》、《辭海》、《國音字典》等一般的工具書，因此就專門的經學研究而言，這兩篇文章的參考價值並不是很高。

其後左洪濤陸續發表四篇與《詩經今注》相關的論文，分別是於《孔孟月刊》發表的〈淺論《詩經今注》的幾點不足〉（註12）；於《中國文化月刊》發表的〈論《詩經今注》的幾點不足〉（註13）；於《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發表的〈《詩經今注》商兌〉（註14）；以及於《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發表的〈《詩經今注》異議〉。（註15）這四篇文章在內容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顧名思義係著重於探討《詩經今注》整體的不足，左氏在充分肯定該書成就的前提下，歸納出《詩經今注》的不足之處有四點，一是「解說詩歌時脫離詩歌形象，刻意求新」；二是「藝術手法上，改舊說中的『比』、『興』為『賦』」；三是「訓詁上，使用通假主觀隨意性強」；四是「方法上，沒有與民俗學研究相結合」。左氏所論的四大不足，頗有見地，其中有幾項觀點與筆者研究的心得相近，但是仍有些微的差異；此外，又因為篇幅的限制，左氏在說明

（註10）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頁395～401。

（註11）盧甲文：〈高亨《詩經今注》訂誤〉，《湖北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1995年1月），頁101～106；〈高注詩經詞語新探〉，《中州學刊》1995年第3期（1995年5月），頁95～97。

（註12）左洪濤：〈淺論《詩經今注》的幾點不足〉，《孔孟月刊》第38卷第6期（2000年2月），頁1～5。

（註13）左洪濤：〈論高亨《詩經今注》的幾點不足〉，《中國文化月刊》第245期（2000年8月），頁74～82。

（註14）左洪濤：〈《詩經今注》商兌〉，《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頁95～99。

（註15）左洪濤：〈《詩經今注》異議〉，《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頁20～22。

時，未能有詳盡的闡述，故筆者將在下文對此一論點作較為完整的闡述。

劉精盛也先後發表了〈《詩經今注》濫言通假評議〉與〈評高亨先生《詩經今注》解題之誤〉（註16）兩篇文章，前篇是針對高亨的《詩經今注》中濫言通假的現象進行比較全面的評議，作者先舉出《詩經今注》裡濫言通假的例證，接著說明濫言通假的原因及其引發的弊端。後一篇則是探討《詩經今注》在解題方面的缺失，這兩篇文章也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

此外，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詩經學史》（註17），其中也對《詩經今注》提出了討論，然而整篇文章僅對《詩經今注》作簡短的解說而已，並未能有深刻的批評，而且大體上只是承襲前人的見解，鮮少自己的意見。

透過以上簡要的敘述，可以得知筆者所能參閱的前人文獻，相當有限。因而產生一些撰寫上的困難。筆者僅能就現有的文本解讀，而後整理出一些概念與重點，故許多觀點，都是筆者的創發，或有不成熟之處，尚祈博雅賢達不吝教導指正。

（註16）劉精盛：〈《詩經今注》濫言通假評議〉，《古漢語研究》2001年第1期，頁83～86；〈評高亨先生《詩經今注》解題之誤〉，《長沙電力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頁2～5。

（註17）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下冊，頁796～798。



第二章 高亨的生平傳略及《詩經今注》之成書與體例

第一節 高亨的生平傳略〔註1〕

高亨，又名晉生，吉林省雙陽縣山嘴子村人，生於清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四（西元1900年7月29日）。父親高學福，原是名打零工的雇農，母親譚氏，終日紡紗、織布、養豬，藉以維持生計，後來因為開墾荒田，兼營小本買賣，家境才逐漸趨於小康。

由於年幼家境清寒，高亨十歲才得以進入鄰村私塾就讀，學名高仙翹。雖然求學的起步較晚，但他卻頗知自勵，八年間熟讀各種經典，為日後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1918年春，高亨考上了公費的吉林省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除正課外，還在地方名士張文澍的指導下，學習了中國第一部文字學專著《說文解字》，研讀了先秦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1923年起，高亨離鄉背井赴北京深造，先進入宏達學院補習

〔註1〕關於高亨的生平事蹟，可參見高亨：〈高亨自傳〉，《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一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90～293。華鍾彥：〈高亨先生傳略〉，《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六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頁268～272。黃沛榮：〈大陸儒林傳（四）——高亨〉，《國文天地》第3卷第11期（1988年4月），頁75～77。董治安：〈高亨先生評傳〉，《山東現代著名社會科學家傳》（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290。董治安：〈高亨先生及其學術成就〉，《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3年第3期（1993年5月），頁37～40。鄭仁佳：〈高亨〉，《傳記文學》第62卷第6期（1993年6月），頁146～148。董治安：〈現代國學研究的辛勤開拓者——高亨先生〉，《文史哲》1994年第5期（1994年5月），頁71～75。

英語，秋季，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隔年秋，改入北京大學，1925年，正式更名為高亨，考入清華大學新成立之研究院國學門（通稱國學研究院）為研究生。

大學生活，特別是清華研究院的生活，給予高亨很大的影響。（註2）當時有傑出的學者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擔任研究院的導師，高氏的畢業論文《韓非子集解補正》，運用《說文解字》變化會通、匡謬補闕，深得梁啟超的嘉許，他曾對高亨說：「陳蘭甫開始把《說文》帶到廣東，希望你開始把《說文》帶到東北。」（註3）並在畢業時贈高氏一副對聯：「讀書最要識家法，行事不須同俗人。」（註4）予以鼓勵。

高亨自青年時期，便立志遵循清代乾嘉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家法，「以文字音韻訓詁為工具，來研讀先秦諸子的遺著，從而抒錄個人的心得。」（註5）並永遠以讀書、教書、寫書等三書為職志，他曾說：「想要教好書，就必須認真備課，認真讀書；能認真讀書，就必有心得體會；心得體會多了，自然要求撰寫成書，再以所寫之書的精華、參以新讀之書的真理，進行教書，就會使質量逐步提高，見識逐年增加。」（註6）高亨於1926年自研究所畢業後，開始教書，起初擔任吉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授兼第一師範學校教席，自1929年起，改任瀋陽東北大學教育學院國文科教授，在這短短幾年間，他也陸續寫出了《韓非子新箋》、《呂氏春秋新箋》、《荀子新箋》、《莊子新箋》，完成了《金石甲骨文字通箋》的初稿，此書稿本裝訂為十四冊，不幸於抗戰時丟失，至今未能尋回，成為高亨直到老年還難以忘懷的一件憾事。

九一八事變後，高亨隨東北大學內遷北京，1933年8月，前往開封，任河南大學教授；1938年初，隨著河南大學文學院遷往豫、鄂交界之雞公山；秋，由豫入川，任武漢大學教授；1940年任遷川北三台之東北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並於此時與羅璘結婚；1943年8月，轉任成都齊魯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8月，挈眷前往陝西西安，任職於西北大學；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同月重返三台東北大學任教；1946年9月，隨東北大學復員瀋陽，又兼東北中正大學、女子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1947年冬，任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8年秋，再度入川，任三台川北農工學院教授，後改任相輝學院教授；1949年11月，重慶淪共後，改任重慶西南師範學院教授、研究室研究員。1952年4月，與夫人羅璘偕子女高嵐、高彥、高雲等

（註2）高亨：〈高亨自傳〉，頁290。

（註3）鄭仁佳：〈高亨〉，頁146。

（註4）高亨：〈高亨自傳〉，頁290。

（註5）高亨：《諸子新箋·序》（山東：齊魯書社，1980年），頁1。

（註6）華鍾彥：〈高亨先生傳略〉，頁268。

返回東北，任吉林師範專科學校教授。高亨在戎馬倥傯物資艱困之際，在堅持執教的同時，仍然持續著學術研究，他在《重訂老子正詁·自序》中提到：

國丁艱難之運，人存憂患之心，唯有沉浸陳篇，以遣鬱懷，而銷暇日。

〔註7〕

他幾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如《周易古經通說》、《周易古經今注》、《老子正詁》等，皆大抵完成於此時。

1953年起，在陸侃如、馮沅君教授的引薦下，高亨受聘於青島山東大學擔任教授，歷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研究室副主任；1957年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這段時期，他陸續發表了《文字形義學概論》、《諸子新箋》、《周易雜論》等專著，以及十多篇論文。

1963年10月，高亨至北京出席由郭沫若主持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討論目前國內外形勢下哲學社會科學戰線之任務，會議期間獲中共主席毛澤東接見，毛澤東不但對於高亨的成績給予極高的評價，還說了些鼓勵的話，為此高亨激動不已，返回濟南後，遂將自己的著作《諸子新箋》、《周易古經今注》等六書，連同一信，寄請當時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轉呈毛澤東，其後不久，即獲毛澤東親筆覆予一函，全文如下〔註8〕：

高亨先生：

寄書寄詞〔註9〕，還有兩信，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

肅此。敬頌安吉！

毛澤東 1964年3月18日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高亨的重視。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高亨旋即受到衝擊，被迫停止工作，不再教書（計任教大專院校凡四十年，開有「國學概論」、「金石甲骨文字」、「文字義形學」、「詩經研究」、「周易研究」、「老莊哲學」、「先秦散文」、「中國文學史」等課程），朝夕接受批判與參加體力勞動，有人批評他「言必稱『任公先生』、『靜安先生』」是「為資產階級政客和亡清遺老張目」，高亨聞之，總是沉默以對，不加申辯。1967年8月，在毛澤東直接干預下，借調至北京，先住

〔註7〕 高亨：《重訂老子正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

〔註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96。

〔註9〕 這裡所指的詞，指的是高亨讀毛詩詞後有感而填寫的「水調歌頭」，詞云：「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起巨龍飛舞，掃滅魔焰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章雲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引自鄭仁佳：〈高亨〉，頁147。

在中華書局，後由國務院文化部部長蕭望東安排住所，加以保護，使其得以專心從事古典學術研究工作。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十年文革浩劫結束，高亨先生受到鼓舞，精神為之振奮，僅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便完成了《詩經今注》，又在助手的協助下完成《周易大傳今注》的校定，並出版了《老子注譯》一書。但此時的高亨畢竟已是耄耋之年，早期罹患青光眼，使得晚年的他視力幾近於零，又由於長期伏案工作，雙腿肌肉萎縮，幾乎不能下床行走，他的最後一部專著《古字通假會典》，在學生們的協助之下才完成收尾工程，而全書出版，則已是他去世三年之後的事了。他原先計畫編寫的一部專著《詩經新解》，僅完成少量的初稿；另外，他還想撰寫一部《太玄經新注》，也只有作了些許的準備工作，留下十餘條的札記。

1986年2月2日清晨，高亨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高亨是一位嚴謹而勤奮的學者，他的治學範圍，從歷史縱向看，似乎主要用力於先秦兩漢一段，魏晉以下較少涉及；但就其橫向考察，則幾乎遍及先秦重要典籍以及金甲文字，兼治文、史、哲。（註10）由於涉獵甚廣，使得他能夠從各類古籍和不同學科的彼此聯繫中，有所融會貫通，正因為如此，他對於問題的鑽研，就常比一般人擁有更多的資料，進而觸類旁通、左右逢源，發前人之所未發。

高亨終其一生在國學領域辛勤開拓，時間長達六十年以上，寫下了十多部的學術專著，發表了若干篇的學術論文，總字數約六百萬字，儘管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仍然要求自己振作精神，丹鉛不輟。有時一稿初成，令其子女幫忙謄寫，則要求字跡工整，不得有一字之誤，抄完之後，還要逐字逐句親自校閱，務使精確而後已，這般的精神是值得後學感佩的。

第二節 《詩經今注》之成書與體例

一、成書時間與寫作宗旨

《詩經今注》寫1980年代晚期，為高亨晚年的作品。高氏一生潛心於先秦文史、哲學、思想研究，兼通文字訓詁、金文鼎銘，《詩經今注》是傾其畢生積累的一部力作，也是他一生研究《詩經》的總結。（註11）

高亨在六十七歲時經歷了文化上的浩劫——文化大革命，自從1966年文化大革

（註10）見董治安：〈現代國學研究的辛勤開拓者——高亨先生〉，頁73。

（註11）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頁396。